

生态政治学: 西方学界对环境问题的再认识^{*}

袁超, 陈品宇, 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提 要: 随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突出, 20 世纪末生态政治学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 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分析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相反, 国内对生态政治学关注不够, 缺乏对西方生态政治学综合性的系统梳理, 对开展相关研究也就带来了障碍。有鉴于此, 文中从研究脉络、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等方面梳理了西方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并提出可能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议题。研究发现: 激进发展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为生态政治学提供了发展动力; 理论基础包括“公地悲剧”、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道德经济与日常抵制、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管制与主体创造; 研究主题包括退化与边缘化、保护与控制、环境冲突与排斥、环境主体和身份、政治客体和行动者。此外, 从切入视角来看, 生态政治学把环境问题放在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脉络中考察, 将地方环境问题的分析逻辑置于不同尺度的关系网络之中, 强调地方性知识、区域和全球变化的环境成本与不同主体之间权力博弈对社会与环境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 生态政治学; 环境问题; 权力; 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 X2-1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诸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 国际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世界银行开始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世界银行资助全球各地大规模造林计划时, 为了保护植被覆盖和动物生物多样性, 被指定为圈养地的山林和住在那里的部落居民实际发生了什么? 这种环境保护计划的实施对于范围内的居民意味着什么? 谁会从保护野生动物的努力中受益, 谁又受损? 这种保护计划如何生产与再生产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这便是生态政治学所关心的问题, 它是一个批判性的研究领域, 吸引了来自生态学、人类学、环境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关注。

自 1987 年由地理学者 Blaikie Piers 和 Brookfield Harold 出版《土地退化与社会》^②(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 一书以来, 生态政治学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并围绕生态政治的相关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相反, 国内学者对生态政治学的研究关注不够, 仅有少数探讨了生态政治学的兴起^[1]、学科属性^[2]及相关概念辨析^[3], 缺乏对西方生态政治学研究综合性、系统性梳理。有鉴于此, 文中从研究脉络、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等方面详细梳理了西方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可能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议题。从理论层面, 有助于理解当今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 扩充生态政治的理论探讨。实践层面上, 以期引起对生态政治研究的关注, 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1 生态政治学的研究脉络

从文献来看, 1935 年 Frank Thone 首次使用了 political ecology 术语^[4]。然而, 生态政治学兴起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它指出现有环境研究的非政治性质, 强调在理解人类活动与环境退化之间关系之时, 应当关注不同尺度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5]。人类学家 Eric Wolf 较早展开了第三世界的生态政

^{*} 收稿日期: 2018-11-21; 修回日期: 2019-4-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5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共享交叉基金(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9ECNU-GXJC002)资助。

作者简介: 袁超(1990-), 男, 安徽淮南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文化地理与乡村旅游研究。Email: 1481534097@qq.com

通讯作者: 孔翔(1975-), 男, 湖南长沙人, 教授, 博士, 从事地方产业与文化空间演变研究。Email: xkong@bs.ecnu.edu.cn

^② 该书已在 2015 年再版。

治问题的研究,但其对后来生态政治研究的影响力有限。较为经典的生态政治研究出现归因于激进发展地理学(radical development geography)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激进发展地理学强烈反对新-马尔库塞理论,批判主流环境研究缺乏政治经济维度的透视。在激进发展地理学家中,Keefe和Wisner主张政治经济结构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这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关灾害主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关于生态政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成果。

除了激进发展地理学对于生态政治学的影响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另一主线来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类学中关于环境主题的研究。文化生态学试图用封闭的生态系统适应行为来解释文化形式和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联系,主张使用生态学视角来强调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稳态和非政治性质^[6]。然而,它却忽视了其所关注的地方层级文化和生态社区构成了更广泛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生态学已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批判文化生态学的学者强调应当在了解影响任何特定地区活动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背景下,对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人类学的解读^[7]。此后,人类学式的地方研究与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的整合成为生态政治学家研究的主要取向。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寻求整合地方研究和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的生态政治学主要转向新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生态政治学者主要采用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式以避免许多文化生态学者和新马尔萨斯学者所做非政治主义(apoliticism)的研究,该阶段注重环境问题政治经济的结构因素分析。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阶段吸收了更多折衷的理论来源,对具有决定主义性质的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许多生态政治学者发现权力关系影响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复杂的,并非线性的、决定性的。因此,生态政治学者开始运用来自政治社会学新韦伯主义(neo-weberian)式的理论,开始关注基层行动者的回避行为和日常抵制。此外,这一阶段受家庭研究和生态女性主义影响的生态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对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控制^[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政治学者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和"话语理论"绘制知识和权力可能相互关联的方式^[9],并以此探究知识与权力影响生态环境的过程和结果。

2 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政治学的兴起是建立在非政治生态(apolitical ecologies)的批判和质疑之上,将生态系统视为充满权力而非政治惰性(politically inert)的系统,它将环境问题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指责近邻和局部力量。生态政治学的共同假设为环境变化与生态状况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变化相关的成本和收益是在行动者之间不平等分配的…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强或降低现存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就改变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言,这包含着政治意涵^[10]。生态政治学研究的交叉性使得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探析生态政治的研究议题之时,倾向使用多样的理论概念来审视生态环境问题。"公地悲剧"、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道德经济与日常抵制、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管制与主体创造都是该领域较常运用的理论棱镜与分析工具。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政治学家运用上述所列举的理论棱镜透视环境问题时,运用层次是不一样的。正如前文所言,生态政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视角批判的基础之上。"公地悲剧"、"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是生态政治学家间接运用的理论工具,旨在批判现有的"公地"管理、环境史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此阐述自己有关"公地"和环境史研究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民研究中的道德经济与日常抵制、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管制与主体创造是生态政治学家直接运用的分析工具。具体而言:

2.1 "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当代生态政治学研究使用较早的重要批判工具之一,其实质是"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该观点认为私人收益可能带来社会或生态成本,自然资源的集体使用必然倾向于滥用和退化,坚持只有集中管制或私有化才能解决集体资源的困境^[11]。"公地悲剧"的论证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其中个体逻辑行为是建立在预期他人行为状况之上。然而,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了"公地悲剧"的失效性^[12]。生态政治学以此出发,认为"公地"之所以未出现"悲剧",是因为实际上成功管理的"公地"在法律上并不是无效的,地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变迁亦会导致特定集体财产管理规则的失效。此外,生态政治学进一步指出了理性选择下的"公地悲剧"观点显然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公地环境理论,未考虑到多尺度权力和不同参与者对当地公地所采取的行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历史脉络亦被忽略了^[13]。因此,

它对于公地环境问题的论证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生态政治学间接运用了现有“公地悲剧”的观点,以此为基础阐述其有关公地环境的理论视角。

2.2 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

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对当下环境问题的历史维度提出了质疑。虽然女性主义发展研究分析了女性生态环境知识的变迁问题。但总体而言,生态环境的研究较为缺乏环境问题历史变迁层面的剖析。目前,环境问题的历史评价局限于当代发展背景之中,多数的实证研究最初并不是历史性的^[14]。批判性的环境史研究指出了当下环境研究在时间尺度上的局限性,提出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是单线的,景观通常会显示出持续的变化、波动、衰退和恢复^[15]。然而,此种环境史的研究同样存在不足,是因为很难从历史文献中编纂出与当代生态调查类似的环境状况的内容。此外,历史叙事是预先设定的,受制于更大背景的限制。实际上,历史写作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行为,它与广阔的事件和运动联系在一起。重新评估历史和科学在政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许多理论家的议程,这对当代生态政治的影响同样深远。

2.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认为环境政治与阶级斗争、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环境退化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16]。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提取力度的增加,势必会出现矛盾,这将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增值,从而可能结束资本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环境退化是资本主义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弱点之一,其有关“社会文化体系是建立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及其关系基础之上,以及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从劳动和自然中提取剩余价值”的观点为生态政治学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思路。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探究社会组织的视角分析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有关:1) 社会与文化关系植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的物体和系统之间的经济互动;2) 外部强加不可持续性的累积采掘制度将会导致环境与社会压力;3) 地方在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市场后将会产生矛盾和依赖的观点^[13]深刻影响了环境问题的剖析。

2.4 道德经济与日常抵制

在以往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传统农业生产被认为是非理性保守、效率低下的,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传统农业应当让位于现代农业安排。然而,生态政治学视角下的农民研究(peasant studies)逐渐证实了此种观点的错误性,并坚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农民的主体性以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研究中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和日常抵制(everyday resistance)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小生产者(如农民)在土地、森林和渔业等资源的生态政治故事中的形象。道德经济的观点认为小生产者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会促使互助和可容忍性剥削社会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发展一种互惠支持的社会安排和关系,帮助其重新分配在不同情境下的盈余以抵御风险^[17]。然而在剥削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民便会通过日常抵制有限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控制^[18]。这种关注农民主体的合作、理性、规避风险、抗拒权威的研究取向^[19]深刻影响了生态政治学的解释方法与分析路径,它旨在避免由土地退化带来的农民偏见,并显示出合作社、小规模生产者及其日常抗争行为的适应性社会逻辑。

2.5 女性主义发展研究

在1970s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援助和投资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明显复苏。与此同时,诸如妇女等相对失权的群体境遇却变得更差。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性别化的^[9],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境况势必会影响其不同尺度上作用于环境的变迁。女性主义发展研究关注性别在环境问题中的角色。在不同社会与文化影响的作用下,男性和女性在体验环境之时存在差异,表现在获取和控制生态环境系统方面亦存在不同^[20]。不同性别在环境系统的可进入性、耐受程度以及抵御环境风险等方面的差异性,部分解释了生态政治学家有关环境冲突和环境变化的议题。但此种论述中的某些基本假设也阻碍了生态政治学家深刻理解政治和生态变化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生产者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时倾向于认为女性更接近自然,未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的社会建构属性。

2.6 管制与主体创造

管制与主体创造为生态政治学剖析环境管理与治理在社区和个人内部正常化的方式提供了概念工具。福柯有关权力知识的观点表明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网络所蕴含的逻辑以支配性的方式生产着处于网络之中的人、团体和机构的逻辑,导致处于网络之中的任何主体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逻辑作为自身的逻辑^[9]。此外,福柯认为规则内在化是日常互动和工作实践的产物。人们不会在深思事物的正确性与适当性的基础上再去实践,而是主体优先做出自身的社会和政治互动,导致实践逐渐管制自身,身体成为政治的场所^[21]。该观点对于生态政治的相关议题如人们如何成为环保主义者(或环保主义的反对者)并通过

何种控制体系使此类主体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提供了分析棱镜。换句话说,生态政治的研究试图去解释人们的环境行为和认同融合在一起的方式,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如何作用于这一方式的生产^[22]。

3 生态政治学的研究主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生态政治可以理解为通过分析权力关系来理解社会与环境系统的状况和变化,旨在寻找饥饿、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社会生态危机的原因而不是问题的症状。生态政治学并非是探究环境议题带来的政治效应,而是探讨环境议题背后,多种知识与意识形态的政治竞逐与权力变化结果^[23]。它不仅强调生态系统是政治的,而且还强调人们之于生态系统的看法也是通过政治与经济过程进一步作用与划定的。生态政治的研究倾向揭示赢者和输者、隐性成本以及导致社会与环境后果背后的差异化权力,它的解释模式在于评估各种变量在多尺度上的影响,每个变量都嵌套在另一个尺度内^[24]。生态政治学具有跨领域研究的特性,着眼于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脉络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对于生态政治学定义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其主题可分为五大层面^[13]。值得指出的是,生态政治学研究主题的五個层面是以2004年Robbins所划分的四个主题为基础的,2012年Robbins本人将主题扩充为五个层面。考虑到Robbins在生态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影响力,本部分以其划分的五个层面为基础,重点阐述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进展。

3.1 退化与边缘化

退化(degrad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较大的政治或经济尺度上来看环境变迁的过程与原因,了解为何边缘族群常被责怪为造成土地退化的原因。Blaikie与Brookfield以第三世界的水土保持问题为中心,指出水土流失的问题是来自于农民在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边缘性(marginality),并详细分析了作为土地经营者的农民为何会在贫瘠的山坡地上采取高强度而非永续的土地利用策略,认为农民因为边缘性而透过生产的社会关系转嫁到环境问题之上^[25]。同样地,Lestrelin对越南土地退化与小农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小农因为处在政治经济的边缘性,而必须去开垦其他生态边际的土地来维持生计的矛盾^[26]。正如Piers Blaikie指出的那样,生态政治学在讨论土壤侵蚀与退化的议题上,要在分析某些农民非永续的、破坏生态环境的土地利用行为时,必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倾向较为破坏性地利用土地来谋求生存?他强调这些农民的土地利用的实践决策背后,其实是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政治与经济脉络的影响^[27]。边缘化是与退化密切相连的概念,它意味着特权与边缘群体的存在,旨在探究特权群体如何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凭借制度性保障形式造成了有害的社会和生态后果。Collins以边缘化和便利化(facilitation)两个概念为基础,从生态政治学视角解读了亚利桑那州怀特山脉地区城市野火灾害风险的生产过程与发生机制,并指出特权群体越多越多的利用国家和市场机构的资源来外化风险^[28]。此外,Collins还从不平等生产和环境灾害风险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大都市洪水灾害的发生过程,揭示了特权群体如何利用其资源将风险外部化并利用某些地区洪水易发的环境机会导致了不公正的社会环境后果^[29]。退化与边缘化的主题意在探讨环境退化与可持续性、资源分配公平性之间的关系,指向了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后果。

3.2 保护与控制

保护(conservation)与控制(control)。长久被认为是好的环境保护活动也会显示出不良影响,甚至带来反效果与保护活动的失败,因此要了解在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下,保护活动失败的原因。该主题旨在探究环境保护目标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保护政策的实施剥夺了传统土地管理者的权力,同时加强了精英社区的目标、愿望和利益。然而,精英社区对生态系统过程、景观或者地方本身的理解和投资都是极其有限的。Martin在对新英格兰渔业管理委员会对渔业资源保护的研究中指出了渔民和保护科学家在生态过程空间认知和保护中的根本分歧,强调了捕捞实践下的生物经济保护与海洋生态系统空间的不相容性。其结果是,保护围栏的实施迫使渔民进入生产力较低的地区或在不同地区捕捞的渔民群体进入公共区域,导致捕捞范围缩小而加剧了过度捕捞的情况^[30]。在保护所带来的冲突方面,Cavanagh探讨了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有关保护政策带来的抵抗问题,分析比较了乌干达埃尔贡山的三个农民群体,发现此三个农民群体通过各种非暴力的、有争议的和正式的法律策略来支持非法种植的总体规划^[31]。在保护所带来的后果方面,Specht评估了巴西62000公顷国家公园内的干旱森林区域的人口贫困与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居住在公园内的大多数家庭(7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公园区域外却只有不到14%的家庭面临同样的问题^[32]。在此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保护区域内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保护国家公园的项目逐渐走向了失败,生活在保护区的人口由于其生产活动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程度。实际上,某些缺乏从实际出发的保护政策不仅使得与保护区密切相关的本地居民和使用者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也由于保护过程中的冲突及不公平性使得保护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非持续性的保护后果。

3.3 环境冲突与排斥

环境冲突(environmental conflict)与排斥(exclusion)。环境冲突属于较大尺度上的性别、阶级、族群纷争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因此要去了解环境的可进入性以及由环境排斥所引发的冲突。Walker和Fortmann研究发现,在经历了快速“郊区化”移民和中产阶级化背景下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县,政府为了满足新进移民对西部景观田园诗般式想象的需要,将景观美学和环境保护原则引入县级规划,直接限制了原先本地居民生产优先的土地利用权力,导致了新进移民和原先本地居民之间不同的区域政治经济立场进而引发了两者在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冲突^[33]。类似地,洪立三以关渡自然公园为例,指出关渡自然公园由于候鸟保护政策的实施,成立了保护区限制了在地居民的自然资源采集活动,引发了保育人士与猎人、农民之间基于生物多样性不同面向的冲突^[34]。由此可见,环境冲突与政策制度、行动者密切相关。Broegaard探讨了老挝不同土地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土地利用规划过程,发现老挝土地政策是多元的、矛盾的,即使地区级土地利用法规未将当地社区排斥在土地之外,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也可能将大多数社区的村民排斥在外,这一过程加强了现有社会的不平等状况^[35]。实际上,政策法规、制度的解释亦充满了权力博弈,并导致冲突的显现。Bottazzi探究了塞拉利昂农村地区习惯性制度安排的解释与改变过程,表明土地收购者和地方当局主导的土地登记过程使得先前习惯性的土地使用权正式化,引发了跨界冲突,内部冲突,跨族冲突和代际冲突,为现有社会政治结构埋下了不稳定因素^[36]。也就是说,当地政府、私营企业或社会精英通过挪用资源而造成稀缺程度不断增加,加速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样,当地方群体通过发展当局、政府代理人或私营公司的管理干预来控制集体资源而牺牲他人时,环境问题变得“政治化”。如此,现有和长期的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冲突也因保护或者资源开发政策的变化而“生态化”。

3.4 环境主体和身份

环境主体(environmental subjects)和身份(identity)。政治认同与社会冲突和生计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议题连接在了一起,因此要去了解政治制度与市场机制如何影响个体和社会群体身份的形成过程。Wainwright追溯了外界对玛雅人身份的认知过程,认为外界在对玛雅土地和文化资源不断表征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区土著人土地所有权、自治权和资源控制权的丧失,建构玛雅人身份是该群体被边缘化和控制的组成部分^[37]。与此类似,Zimmerer在玻利维亚的案例研究中,强调政府在对文化知识落后的小农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认为由于小农自身文化知识的原因造成土地利用不当,从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流失,该主流观点忽略了农民长久以来与土地直接相处的亲密互动与土壤的侵蚀知识,也未考虑小农耕者贫困的生计处境如何影响他们对土地利用方式等造成土壤侵蚀的根本性原因^[38]。然而,环境主体和身份的研究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它是复杂、动态的。Agrawal以印度库马翁为案例,探究了政府与农民主体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并展示了与社区决策相关的监管策略如何影响参与政府的农民主体,提出了从权力和自我两个层面理解新政治主体出现的分析框架^[39]。Williams则分析了种族身份影响农业系统多样性的维护过程,从民族认同的塑造作用切入,强调尼加拉瓜加勒比海沿岸自治区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权利的重要性,它是直接和间接影响珍珠礁湖盆地农民种族身份的关键因素^[40]。在环境主体的观念建构方面,Meek借鉴了教育生态政治学框架,以巴西职业高中的政治教育项目(political pedagogical project)为例,探讨了教育在环境知识的共同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教育在构建学生主体理解权力、政治经济和土地管理之间联系具有重要作用^[41]。环境主体和身份的研究议题探究了生态学视角下的行为和生计如何影响主体有关环境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反过来作用于主体身份的建构,旨在分析主体行为、观念、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3.5 政治客体和行动者

政治客体(political objects)和行动者(actors)。政治和经济系统被与其交织在一起的非人类行动者所支持和影响,因此要了解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政治状况如何作用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变迁。Freidberg研究了肉、鸡蛋和水果的历史,发现有关这些物质的“新鲜”说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资本主义运输、生产和加工的产物,有关物质“新鲜”的案例研究表明物质事物是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意

义上的社会建构,它围绕客体、网络 and 权力的隐形叙述而组织^[42]。物质的非人类性质特点及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类世界的博弈,并与人类世界交织在一起。尹铎以广州鳄鱼公园为例,深入分析了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系运作,是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社会现象剖析之中的有益尝试,为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43,44]。从非人类行动者商品化的视角出发,Barua 探讨了印度旅游业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狮子和大象商品化的过程,提出了动物能动(agency)的生态学和非二元论的解释可以整合到自然作为资源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中^[45]。Margulies 则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整合的视角,以印度卡纳塔克邦班迪浦尔国家公园周围的乡村社区为例,分析了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国家话语以及乡村社区对人与野生动物相互作用变化的看法,研究表明生态政治学能够在保持对社会正义的承诺的同时,更适应动物作为政治行动者^[46]。生态政治学有关政治客体和行动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关系、网络与形成(becoming)的视角,强调非人类是复杂关系中的行动者,影响着权力关系网络之中的个体、组织及其认同和制度的形成。

4 结论与展望

文中在梳理西方生态政治学的研究脉络、理论基础及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发现生态政治学在分析环境问题之时,不囿于环境问题本身,而是将问题置于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系统的脉络之中考察,对既定经济、政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尤其在审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时,主张辩证地认识社会-自然系统,并将地方环境问题的分析逻辑置于不同尺度的关系网络之中,强调地方性知识、区域和全球变化的环境成本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权力博弈对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提供了认识环境问题的新思路。综合现有研究主题和中国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好生活的目标,为深入理解环境问题,提出以下可能进一步开展的研究议题:

4.1 群体社会边缘化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以往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自然系统,对认识环境问题在自然层面的形成机理有了深刻认识。然而,在审视环境退化的问题之时,生态政治学主张辩证认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不仅要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环境问题在自然层面的形成机理,也要注重环境问题与群体阶层之间关系的探究。即为什么是农民、牧民而不是其他群体造成了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等问题,更进一步需要探讨的是群体政治、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机制,而不仅仅是指责社会边缘化的群体而忽视了更为广泛、深刻的政治经济力量。例如,在探讨牧民饲养牲畜数量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应考虑牧民的生计处境及群体边缘化如何影响土地利用的方式及强度。

4.2 保护区设立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评估

随着社会各界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设立保护区成为了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手段,例如森林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类型。然而,伴随着保护区的设立,必然涉及到区域环境的保护与控制问题,那么这种保护与控制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实践造成了什么影响?对其生计变迁又造成了什么影响?是否有利于周边居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发展?相关研究表明长久被认为是好的环境保护活动也会显示出不良影响,甚至带来反效果与保护活动的失败。因此要把保护区设立的目标与实际效用评估结合起来,应当分析在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下,保护活动为何与设立目标不一致的原因。那么从居民主体性视角出发,评估保护区的设立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从而切实将居民纳入到保护区的管理之中,有利于实现保护区设立的最终目标,实现居民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

4.3 社会建构视角下地方性环境知识研究

在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充分挖掘多样的地方性环境知识无疑会为当下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相关研究表明以往农民、土著的地方性环境知识是有助于生态环境维护的,只是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尺度上,地方性环境知识被掩盖与边缘化了。作为批判性的环境研究,生态政治学致力于揭露从地方企业到国际社会上不同尺度的权力主体所主张的环境知识的缺陷,通过不同的案例研究说明政策和市场状况对环境变化的不良影响。特别是从本地居民、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探讨此类群体在环境问题之中扮演的角色。这在方法论层面,要求关注传统实践方式的历史变迁以及当地居民对地方性知识和生态过程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陈清硕. 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 社会科学, 1995 (4): 71-73.

- [2] 李刚. 生态政治学: 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2): 21-27.
- [3] 芮国强. 生态政治学概念辨析[J]. 学术界, 2003(4): 64-70.
- [4] Nepal S, Saarinen J. Political Ecology and Tou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16.
- [5] Bryant R L. Power,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third world: a review[J].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1998, 22(1): 79-94.
- [6] Adams B.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Developing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2008: 15-19.
- [7] Grossman I S. Peasants, Subsistence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Highlands of Papua New Guine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0-133.
- [8] Schroeder R A. Shady practice: gen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stabilization in Gambian garden/orchards[J]. Economic Geography, 1993, 69(4): 349-365.
- [9] Cresswell T. 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2: 196-239.
- [10] Bryant R L, Bailey S. Third World Political Ecolog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0-25.
- [11] 朱宇江.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对称性论证述评[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6(3): 116-21.
- [12] 张耀启, 吴冠宇, 邵长亮, 等. 从内外蒙古草地产权差异看"公地悲剧"与"私地悲剧"之争[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 23-29.
- [13] Robbins P.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2: 49-82.
- [14] Mcsweeney K. The dugout canoe trade in central america's mosquitia: approaching rural livelihoods through systems of exchang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4, 94(3): 638-661.
- [15] Cronon W.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M]. New York: Norton, 1995: 91-103.
- [16] 张云飞.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视界[J]. 社会科学辑刊, 2018(2): 49-56.
- [17] Scott J C. Resistance without protest and without organization: peasant opposition to the Islamic Zakat and the Christian Tith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7, 29(3): 417-452.
- [18] Scott J.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86, 13(2): 5-35.
- [19] Duijvendak M. 道德经济及其超越-19世纪荷兰农民抗税研究[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5, 17(5): 5-10.
- [20] Plumwood V. Integrating ethical frameworks for animals, humans, and nature: a critical feminist eco-socialist analysis[J].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2000, 5(2): 285-322.
- [21] 伍小涛. 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19-26.
- [22] 马亭亭. 理解生态政治: 话语分析的视角[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105-113.
- [23] Greenberg J B, Park T K. Political ecolog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1994, 1(1): 1-12.
- [24] Thompson-Carr A, Shelton E, Norum R, et al. Political Ecology of Tour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23.
- [25] Blaikie P, Brookfield H.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7-37.
- [26] Lestrelin G. Land degradation in the Lao PDR: discourses and policy[J].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424-439.
- [27] Blaikie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47-154.
- [28] Collins T W.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hazard vulnerability: marginalization, facilit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l risk to urban wildfires in Arizona's White Mountai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2008, 15(1): 21-43.
- [29] Collins T W. The production of unequal risk in hazardscapes: an explanatory frame applied to disaster at the US-Mexico border[J]. Geoforum, 2009, 40(4): 589-601.
- [30] Martin K S. Making space for community resource management in fisheri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1, 91(1): 122-142.
- [31] Cavanagh C J, Benjaminsen T A. Guerrilla agriculture? a biopolitical guide to illicit cultivation within an IUCN category II protected area[J].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5, 42(3-4): 725-745.
- [32] Specht M J, Santos B A, Marshall N, et al.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among resident, users and neighbour populations of a protected area in the Brazilian dry fores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9, 232: 607-614.
- [33] Walker P, Fortmann L. Whose landscape?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éxurbanSierra[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3, 10(4): 469-491.
- [34] 洪立三, 许嘉恩. 交界带的政治生态学居民對於关渡自然公园作为「资源」与「地方」的看法[J]. 地理学报(台湾), 2010, 60: 1-22.
- [35] Broegaard R B, Vongvisouk T, Mertz O. Contradictory Land use plans and policies in Laos: tenure security and the threat of exclusion[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89: 170-183.
- [36] Bottazzi P, Goguen A, Rist S. Conflicts of customary land tenure in rural Africa: is large-scale land acquisition a driver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6, 43(5): 971-988.
- [37] Wainwright J. The first duties of persons living in a civilized community: the Maya, the church, and the colonial state in southern Belize[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9, 35(3): 428-450.
- [38] Zimmerer K S. Soil erosion and social (dis) courses in Cochabamba, Bolivia: perceiving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1993, 69(3): 312-327.
- [39] Agrawal A. Environmentality: Community, intimate government, and the making of environmental subjects in Kumaon, India[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5, 46(2): 161-190.
- [40] Williams N E.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ethnic"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 in Atlantic Nicaragu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2016, 23(1): 223-245.
- [41] Meek D. Taking research with its roots: restructuring schools in the Brazilian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upon the principles of a political eco-

- gy of educ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2015, 22(1): 1–19.
- [42] Freidberg S. *Fresh: A Perishable Hist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8.
- [43] 尹铎, 高权, 朱竑.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J]. *地理学报*, 2017, 72(10): 1872–1885.
- [44] 朱竑, 尹铎. 自然的社会建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09–1816.
- [45] Barua M. Lively commodities and encounter valu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6, 34(4): 725–744.
- [46] Margulies J D, Karanth K K. The production of human–wildlife conflict: a political animal geography of encounter[J]. *Geoforum*, 2018, 95(7): 153–164.

Political ecology: 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western academia

YUAN Chao, CHEN Pinyu, KONG Xiang

(The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litical ecolog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western academi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analyz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n the contrary, Chinese scholars pay less attention to political ecology, which brings difficul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es the main content of Western political ecology research from its orig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themes, and finally tries to propose research agenda that would expand this field further. It is found that radical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cultural ecology provid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political ecology.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clude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critic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moral economy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feminist development studies,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creation of subjects. There are five themes, including degrad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nd exclusions, environmental subjects and identities, political objects and actors. From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ecology emphasizes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should be studied in a broad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relational network of different spatial–temporal scales, which also stresses that the local knowledge, the cos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from regional to global, and the power game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play the important role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Key words: politic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issues; power; rethinking